

法國與非洲法語系國家的關係

楊逢泰

一 非洲砂礫上的殖民帝國

十六世紀初期，英國人、法國人以及荷蘭人隨着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之後在西非沿海建立前哨據點。一六五九年，法國在塞內加爾河口（Senegal River）建立了一聖路易鎮（Saint Louis）。十一年後，法國人佔領了哥里島（Gorée）法國的公司以法國國王的名義在這些據點行使政治和經濟權力。他們從事黃金、象牙和香料的物物交換貿易。

拿破侖戰爭轉移了歐洲人對非洲的注意力，一八一五年維也納條約訂立以後，法國僅保留了在塞內加爾的居留地，和在馬達加斯加的一個據點，在路易腓力（Louis Philippe 1830-1848）統治下的法國佔領了象牙海岸的沿海地帶，而且還有向非洲內陸滲透的意圖，從一八四八年到一八七〇年，法國的工業生產劇增，需要新的市場，所以第二帝國時代也是法國新殖民時代的開始，一八六三年，塞內加爾總督費特罕貝（Faidherbe）建立了達卡港（Dakar）。其後藉口制止奴隸貿易，法國人沿着幾內亞、象牙海岸、加彭和達荷美的海岸與土著訂立條約，建立了保護國。

一八七一年普法戰爭失敗後，爲了醫治失敗創傷和恢復法蘭西的光榮，法國在俾斯麥鼓勵下開始與歐洲列強競爭，擴充她的非洲殖民帝國。以西非沿海的據點和保護國爲基礎，法國軍人和探險家向內陸遠征，同時在紅海沿海，法國佔領了吉布提（Djibouti）和索馬利亞沿海地帶，希望建立從達卡經查德到紅海的軸心（French Daker-Chad-Red-Sea axis）。

法國與非洲法語系國家的關係

一八八四年，俾斯麥因受國內商人的壓力加入了列強在非洲的競賽，德國的加入，引起了歐洲的國際危機，因此有一八八五年柏林會議的召開，歐洲列強在會議中紙上瓜分了非洲。列強協議，任何一個國家如果在沿海佔有居留地可以主張內陸的所有權，可是此項主張必須以有效佔領，以及立即通知其他簽字國始得有效爲原則。因此，法國積極由沿海向內陸進展，一八九五年，法國將塞內加爾、幾內亞、達荷美、象牙海岸和蘇丹五個殖民地組成了一個聯邦，稱爲法屬西非（l'Afrique Occidentale Française, AOF）。其後，尼日、上伏達和茅利塔尼亞也成爲聯邦的一部分。一九一〇年，法國又將加彭、中剛果、和烏班基—夏里（Ubangi-Shari）（即現在的中非共和國）三個殖民地組成了一個聯邦，稱爲法屬赤道非洲（l'Afrique Equatoriale Française, AEF）查德則由軍政府予以控制，在一九二〇年代成爲赤道非洲聯邦的成員。

一八八五年後，法國試圖征服馬達加斯加而遭遇到英國的反對，一八九〇年英法獲致協議，法國允許英德兩國分別取得肯亞和塔干伊喀，交換英國允許法國在馬達加斯加的自由行動，一八九八年法國兼併了此一島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德國在非洲的殖民地多哥和喀麥隆變成了法國的托管地。

在本世紀初葉，法國完成了她在黑色非洲的殖民帝國，包括八百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和二千萬以上的人口，法國在列強瓜分非洲時獲得了最大的部份，可是除西非沿海象牙海岸一帶較爲富庶之外，其他如赤道非洲大都是沙漠地帶，英國沙利斯堡爵士（Lord Salisbury）曾譏諷法國人說：『法國這隻公雞是喜歡扒砂礫的。』如果說：殖民主義是工業革命政治的產兒，就法

國而言，其另一意義是恢復普法戰後法蘭西所失去的光榮；其動機並不像英國人那樣純粹是爲了商業利益。

二 同化政策和非洲人的自覺意識

法國的殖民政策基於一項根本的信念，就是要將海外的殖民地與母國統一起來，而期望海外領土對法國履行忠誠和愛國的義務。法國對熱帶非洲採取同化政策，此一政策根源於法國大革命時代所表現人類完全平等的理想，當時在黑色非洲的殖民地僅有塞內加爾和幾內亞的幾個貿易站，也可以說是奴隸市場，一七九五年第一共和時代，這些地區都變成了「省」(département)，而是不可分割的部份，當地居民包括奴隸在內也變成了法國子民，一八四八年第二共和，將在拿破崙時代所建立的奴隸制度廢止，拿破崙第三有一個雄心勃勃的殖民理想，他自認爲是法國的皇帝也是阿拉伯人的皇帝(在阿爾及利亞)。他希望將法國公民的資格給予阿拉伯人而未能實現，可是在第三共和時代，很多阿爾及利亞人獲得了公民資格，一八七二年，法國在塞內加爾的達卡(Dakar)、聖路易(Saint Louis)、羅非斯克(Rufisque)和哥里(Gorée)建立了四個實驗社區，居民有特別的權利和公民地位，可以自己選舉市長及市議會，在第二次大戰前，同化政策僅限於這四個社區而已。

法國對土著的統治，稱爲直接統治(Direct Rule)。這是由軍隊所支持的統治方式。例如在幾內亞就設有十七個軍區，以軍區司令爲行政首長，可是在許多情形之下，殖民政府因爲缺乏人員，不得已利用酋長，在平定土著的反抗後，土著的權力制度一般的均遭廢除，挑選有能力而忠於法國的酋長作爲統治的工具，英國人允許非洲人依照非洲的傳統和土著的創見來治理非洲人，而法國人是利用酋長依照法國的方法和制度來統治非洲人。直接統治鼓勵統一發展和中央集權，而不允許區域主義(regionalism)的抬頭，所以法國的屬地在獨立後比英國的屬地容易建立單一的政治制度。

法國的教育政策遵循將海外領土和法國統合的原則，其目標是將殖民地人民同化在法國的制度和文明之中，法國人同樣的受「白種人負擔」(white-man's burden)這種理論的影響，而認爲凡是有才智和理性的非洲人願意接受法國的文化。被同化的非洲人，在理論上能够與法國人在平等的基礎上

從事任何職業，具有全部權利，可是歸化的資格各時期不同，通常是包括：忠於法國，在帝國內服務十年，有閱讀和寫作文法文的能力、良好的品格、正當的職業和沒有犯罪紀錄。因此非洲人能獲得公民地位的爲數很少。而且申請的手續非常繁雜，使許多合格的非洲人爲之裹足。而且公民地位的取得並不一定保證獲得平等的權利，在一九二二年前僅有兩千人獲准歸化。

法國的教育重點在訓練有天賦的非洲人。希望他們成爲同化的知識中堅份子，因此絕大多數平庸的非洲人所受的教育只能適用於村落生活，在殖民初期，大多數的學生只能接受一年的教育，課程包括口語法文、心算和衛生以及農業技術等。其目的在促進生產和提高農產品的質量，較爲優秀的青年可以再接受兩年或三年的教育，如果他們表現卓越的才能，就被送到區域學校(regional school)接受手藝和職業訓練，殖民當局於一九〇三年在塞內加爾創辦了二十三所叢林學校(bush school)；一九一〇年在聖路易創辦了一個中等學校，因此一個接受高等訓練的知識中堅份子逐漸脫穎而出，具有高等的經濟和社會地位。他們可以擔任行政工作，並可競選官員，一九一四年後，在法國國會中的非洲議員增加了名額。

法國的同化政策對於傳統當局和傳統文化是一種正面的攻擊。對於部落制度的瓦解，法國當局鮮於注意，今天的許多非洲領袖批評法國的政策，認爲法國所教育的中堅份子，構成了一個職業階級；他們在意識上是法國的而不是非洲的，雖然有少數中堅份子接受了非洲文化是次等的觀念，可是很多非洲人並沒有喪失其爲非洲人的意識，幾內亞總統杜瑞就有鄙視知識份子的態度，認爲真正的非洲文明在鄉村。

奧立佛(Roland Oliver)在「一八〇〇年以來的非洲」(Africa Since 1800)一書中說：英法屬地的人民對民族主義的態度可以恩克魯瑪和桑果兩人的生活作一對照，當恩克魯瑪在爲黃金海岸起草獨立憲法時，桑果正在巴黎寫作詩文。

一九三四年代，倫敦是泛非洲主義的政治運動中心，而巴黎是泛非洲主義的文學運動中心，從巴黎發源的「黑人意識運動」(Negritude movement)，對於法語系的非洲領袖有很大的影響。原來，桑果在巴黎時曾接觸許多政治和文學思想，他與來自法屬西印度的茜賽瑞(Aimé Césaire)成了莫逆之交。這兩位青年人深深地感覺到：在直接認真處理政治問題之前，必

須先恢復非洲文化價值的信念。他們意識到非洲文化遺產的價值，而予以重新估價，他們兩人發展了一種新的種族意識，即文化意識（cultural consciousness）。依照西賽瑞所鑄造的一個新名詞，這種文化意識稱為「黑人意識」（Negritude）。所謂「黑人意識」是指「黑人思想和行為中某種共同的優美品質。它代表黑色人種新的自覺，新獲得的自信心和與非黑色人種迥異的那種卓越人生觀」。換言之，作為黑人有一種驕傲。這是非洲知識份子直接觸法蘭西文化後的一種反擊。這種文化的民族主義（Cultural nationalism）與政治的民族主義（Political nationalism）是一個錢幣的兩面。

三 法蘭西聯邦的徬徨

二次大戰中，法國陷落後，查德總督艾波（Félix Eboué）於一九四〇年八月二十六日宣佈響應自由法國，法屬赤道非洲各屬地相繼效法查德。幾經周折，馬達加斯加和法屬西非於一九四二年底始參加自由法國，一九四四年一月和二月間，為了感謝非洲殖民地在大戰中效忠法國的態度，自由法國的官員在布拉薩市（Brazzaville）舉行會議，其目的在確定法國與其海外領土之間的未來關係和發展的途徑，當時的殖民部長普利汶（René Pleven）發表演說稱：

我們有時了解：此一戰爭必須與所謂殖民地各民族解放同時結束，在包括許多殖民地的大法蘭西中，並無需要解放的民族，在這些殖民地中，僅有他們自己感覺是法國人的民衆。他們希望在法蘭西社會的生活和民主的制度中克盡更大的責任。我們的意見是：領導這些人民一步一步的走向有自我生存的能力。那些最成熟的可以獲得政治的自由。可是除法國的獨立外，我們無意考慮任何其他的獨立問題。

布拉薩市會議的結果奠定了戰後大部份改革的基礎，可是法國並沒有考慮殖民地的獨立問題，戰後在合作和樂觀的氣氛下，非洲各屬地選派代表參加一九四五年和一九四六年的法國第一屆和第二屆制憲大會。在大會中許多非洲代表宣佈效忠法國。象牙海岸的伍弗布尼說：

在這些議席上沒有分離主義者……讓我們全心全意的為一個更好、更偉大、更堅強的法蘭西聯邦而努力……我們並不是由於法國的金錢——她的

法國與非洲法語系國家的關係

法郎，而附屬於法國，而是有一種強有力的結合——道義的結合使我們團結在一起，它能抵抗所有的考驗。這就是自由、博愛、平等的理想……如果我們說：法蘭西聯邦將有一天變成一個多民族的國家，這似乎並不輕率。

來自塞內加爾的桑果說：

法蘭西聯邦是一個文明的結合，是一個文化的熔爐……與其說這是一個聯合，無寧說這是一個婚姻，我們聯繫在一起，將締造一個以巴黎為中心的新的文明。

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七日公佈的新憲法，使第四共和國代替了第三共和國，法蘭西聯邦（French Union）代替了法蘭西帝國（French Empire），她的殖民地也變成了海外屬地（Overseas territories），可是第四共和國憲法第一條規定共和國與海外屬地是不可分離的，屬於海外法國部（Ministry of Overseas France）。除多哥和喀麥隆為仲屬地（associate territories）外，其他海外屬地均為法蘭西聯邦的成員。憲法也沒有規定海外屬地最後取得獨立地位的原則。憲法規定非洲人享有三種選舉權，各海外屬地的議員選舉權，法屬西非聯邦或赤道非洲聯邦議員的選舉權，以及法蘭西共和國國會議員的選舉權，在第四共和國國民議會（Constituent Assembly）的六百個席次中，有六十三名是保留給殖民地代表的。

一九四六年十月間，法屬西非和赤道非洲的代表們在巴馬科（Bamako）舉行會議，討論如何在法蘭西聯邦內取得平等的待遇。因而組織了非洲民主聯社（Rassemblement Démocratique Africain）。在成立後的前四年中，非洲民主聯社與法國共產黨合作，向巴黎施展壓力，一九四七年，法共脫離法國的聯合政府而成為反對黨，一九四八年終，殖民當局奉命鎮壓法共的同盟份子，非洲民主聯社的黨員有十多人被殺，數千人入獄，該黨領袖伍弗布尼於一九五〇年決心脫離與法國共產黨的同盟關係，非洲民主聯社揚棄馬克思主義路線後，變成了一個被人接受的政黨，採取「暫時停止活動的政策」（policy of quiescence），小心翼翼的遵循着伍弗布尼的格言：「在危急時機，無所行動就是一種積極的態度（In a period of crises, inactivity is a positive attitude）。」該黨在法國國會中與採取中間立場的政黨聯合起來，主張效忠法國。宣稱：

將法國和海外領土分開是不可思議的事，我們的命運已交織在一起，其迫切的必需性命令我們全盤研究建立法蘭西聯邦的方法和可能性……歷史已展開一完全空白的新頁，在這一頁上，我們寫下我們的決定：將非洲轉變為法蘭西聯邦最偉大、最完美和最忠實的領土。

桑果於一九四八年建立了塞內加爾民主集團（Bloc Démocratique Sénégalais）。其時因為非洲民主聯社與法共聯盟，所以，塞內加爾民主集團拒絕加入非洲民主聯社，一九四八年十一月，桑果以個人身份參加了另一個由在法國國會中非洲代表們所組織的海外獨立黨（Independants d'Outre-Mer），因而當非洲民主聯社主張效忠法國之際，在桑果領導下的海外獨立黨要求改變法蘭西聯邦的結構，敦促法國為法蘭西聯邦制定新憲，給予各海外領土的國會更大的權力。

一九五四年，北非和越南的局勢惡化，法國因阿爾及利亞的問題，已無力拒絕非洲人的要求，尤其明顯的是法國勢不能進一步推行其所謂的同化政策；否則，依照平等的原則，法國國會中的非洲議員將大量增加，法國將成為「其殖民地的殖民地」（a colony of her colonies）海外領土部遂於一九五四年七月宣佈法國政府有意賦予海外領土的議會更大的權力，可是由於法國的政局不穩而拖延了兩年之久。

法國終於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三日頒佈了綱領法（Loi Cadre）作為未來憲法、行政和經濟改革的基本原則，綱領法將立法權分為國家權力（state power）和領土權力（territorial power）兩種。前者包括國防、外交、幣制、經濟發展和高等教育等，保留給法國國會；而後者包括農業衛生、初等和中等教育、國內貿易以及文官制度等，由各海外領土的國會實施立法權。各海外領土的議會依照成人選舉權的原則來選舉，政府會議則由議會所選舉的部長組織之。其中獲票最多者為政府會議的副主席（Vice-President）、總督為主席（President），綱領法代表着法國第一次將相當的權力轉移到非洲領袖們的手中，這是法國與海外領土關係的重要轉捩點。

一九五六年八月，實施綱領法的第一道行政命令，將多哥的地位改變為法蘭西聯邦中的自治共和國（autonomous republic），設總理和立法機關，其立法權則按照海外領土的方式予以劃分。一九五七年，喀麥隆亦獲得了同樣的地位。

綱領法頒佈以後所實行改革引起了法國與其海外殖民地之間的關係問題。根據綱領法，法屬西非和赤道非洲兩個聯邦實際上已不存在。法國政府瞭解：法蘭西聯邦這個超國家（super-state）的計劃勢必由一個更鬆懈的類似英國協的組織取而代之。

伍弗布尼的非洲民主聯社和桑果的海外獨立黨對此問題發生了嚴重的歧見。桑果主張採取聯邦政策（federal policy），由法國的海外領土組成一個獨立的聯邦，然後再和法國聯合起來，成為集體的關係（collective relationship）。而伍弗布尼主張的是領土政策（territorial policy）。即各海外領土分別獨立，然後再和法國聯合起來；成為個別的關係（individual relationship）。因為象牙海岸是法屬非洲中最富裕的國家，如果採取桑果的聯邦政策，象牙海岸勢將貼補聯邦內其他份子國的財政。當綱領法制定時，伍弗布尼在法國政府中担任部長職位，對綱領法當然有很大的影響力。而桑果反對這種個別的關係，認為這不啻是法屬非洲的巴爾幹化（Balkanization）。因為如果按照伍弗布尼的主張，各海外領土在法蘭西聯邦中將成為很小的自治共和國，無論在人口和領土各方面均不足與法國抗衡，容易受法國的控制。

四 曇花一現的法蘭西社會

一九五八年五月十三日，在阿爾及利亞作戰的法國陸軍因不滿法國的政策，控制了阿爾及利亞，第四共和國崩潰，戴高樂在退休中被徵召組織新政府。七月，第五共和國的憲章公佈，並定於九月間舉行新憲的公民投票，對海外領土而言，有兩項選擇，即在取代法蘭西聯邦的法蘭西社會（French Community）內獲得自治共和國的地位，或者是完全和立即獲得獨立。

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八日的公民投票是一項決心的危機。法語系的非洲領袖面臨一項抉擇。就伍弗布尼而言，身為戴高樂政府的閣員，要求立即完全獨立是不可想像的事。可是桑果和他的支持者躊躇不定。他們堅持聯邦的觀念，然後再來與法國談判未來的關係，惟恐立即獨立後變成巴爾幹化。在最後關頭，僅杜瑞的幾內亞拒絕了戴高樂的建議。杜瑞懷疑：新的法蘭西社會是法國繼續控制的一種偽裝而已，而且他是位泛非洲主義，對於建立西非聯

邦的失敗感到非常失望，因而投了反對票。當杜瑞決定獨立時，法國立刻停止一切援助，撤退了所有的公務員和技術人員，杜瑞變成了戴高樂經濟體系之外的政治孤兒。

這次公民投票為二次大戰後法國與其非洲殖民地關係的第二個轉捩點，法語系非洲的政治已從巴黎轉移到非洲，法語系非洲的領袖的注意力從「聯邦」轉移到建立民族國家。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塞內加爾、蘇丹、達荷美和上伏塔同意成立一個聯邦，沿用古代在西蘇丹的馬利帝國為名，而稱為「馬利聯邦」。可是在一九五九年三月，達荷美和上伏塔因為來自象牙海岸的壓力和內部的問題而改變了初衷。塞內加爾和蘇丹遂於四月間組成了聯邦。桑果和凱達（Modibo Keita）要求在法蘭西國協內取得完全獨立的地位。依桑果的說法：「我們的目標是建立一個聯邦共和國（federal republic），在一個聯邦的社會（confederal community）內與法國聯繫在一起。」一九五九年九月，桑果和凱達在達卡舉行會議，決定要求獨立，將法蘭西社會的功能轉移到馬利聯邦。

法蘭西第五共和國憲法第八十六條規定：法蘭西社會內的任何成員其後成為獨立國家時即停止為成員的地位。一九五九年十二月，法蘭西社會的行政首長在第六次會議中決定允許馬利聯邦獨立，而仍然留在法蘭西社會內。馬拉加西亦決定做馬利聯邦的先例，兩國分別與法國簽訂協定，獲得了獨立地位。一九六〇年六月馬利聯邦分裂，變成了塞內加爾和馬利（蘇丹仍沿用馬利為國名）。

聯合國在西非的托管地多哥和喀麥隆是分別由英法托管的：英國托管的多哥在一九五七年的公民投票中贊成與迦納合併；而法國托管的多哥於一九六〇年變成了獨立的共和國。喀麥隆不幸於一九五六年發生內戰，由非洲民主聯社分裂而出的喀麥隆人民聯盟（Union des Populations du Cameroun）在尼奧卑領導下，獲得國際共黨的支援，進行叛變。一九六〇年喀麥隆在內戰方殷中獲得了獨立。一九六一年舉行公民投票，北部人民決定留在奈及利亞，而南部人民決定與法屬喀麥隆合併，成爲一個聯邦共和國。這是第一次將兩個不同語言和經過不同殖民統治的地區聯合起來。

一九五九年五月間，象牙海岸、尼日、達荷美和上伏達組成了四國協商

法國與非洲法語系國家的關係

，主要是協調經濟方面的合作。四國均要求獨立。一九六〇年十一月時，所有法屬西非和赤道非洲的殖民地均變爲獨立國家，法蘭西社會變成了法國與法語系非洲獨立國家之間的一連串雙邊協定。法蘭西社會的成員國家與法國的關係不再受法國憲法的支配，而是受這些雙邊協定的支配。依照法國政治學家杜佛如（Maurice Duverger）的說法，一九五八年的「立憲社會」（Constitutional Community）演變成爲新的「契約社會」（Contractual Community）。

嚴格的說，戴高樂個人賦予法蘭西社會成員獨立地位是違憲的。一九六〇年六月通過了一項法律，消除了獲得獨立和社會成員地位不能共存的規定。一九六一年七月法蘭西社會的原有機構，如行政首長會議和參議院等均告廢止，代之以新設立的國家元首會議（Conference of Chiefs of State）。有關法國與法語系非洲國家之間的政治和安全等問題均由雙方外交部長處理。此外第五共和國的總統在名義上雖然仍然是法蘭西社會的總統，可是成員國家既不參予選舉法蘭西社會的總統，而且在憲法上，法蘭西社會總統對於「法蘭西社會權限」內所作的決定亦不復有控制力量，所以法蘭西社會的總統所扮演的角色在理論上是禮儀性質的，正是英國女王在英國協內的地位一樣。

在實際上，因爲戴高樂個人的聲望，法國的大批技術顧問教師和大量法援，法國對於法語系新興國家的政策決定仍然有很大的影響力，戴高樂並任命了一位國協和非馬事務總統秘書長（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Presidency for Community and African and Malgasy Affairs）來協助他處理這些非正式的功能。此外設立非馬事務理事會（Council for African and Malgasy Affairs）。這是一個協調法援的機構，與會人員除上述非馬事務秘書長外，尚有外交部長和合作部長等。而由合作部負責策劃對新興國家的援助計劃。法蘭西社會已變成歷史的陳跡。

五 法蘭西的文化帝國

法蘭西社會十四個自治共和國在一九六〇年均變成了獨立國，與法國簽訂了合作協定（馬利在一九六二年，多哥遲至一九六三年分別與法國簽訂了

合作協定)。此項合作協定為法國提供援助的基礎，包括財政、貨幣、商業、文化、社會和技術等各方面。此項協定雖然是雙邊性質，但形式很少改變，甚至是相同的，具有同樣的精神。合作協定的序言稱：「法國與非洲的合作旨在保持密切、多方面和基本的連繫……此種合作可稱為主權國家間新型的關係。」大致上，法國提供各方面的援助，而受援國則留在法郎區內。塞內加爾、馬拉加西和赤道非洲四國仍留在法蘭西社會內；因此，法國與這些國家的協定內容較為廣泛，包括外交和防禦的協調在內。

法援的數字是非常龐大的。英國協的人口有七億，而法語系十四個非洲國家的人口僅相當於奈及利亞的人口，約五千多萬，可是法援的經費幾乎兩倍於英國對國協國家的援助。就一九六六年而言，法國援外經費佔總預算的百分之二·七〇，這是任何國家所不及的。一九六八年，法國援外經費共計南非幣九五〇、七五〇、〇〇〇 Rand，而其中大部份是給予非洲法語系國家的，從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九年的十年中，法國對法語系非洲國家的援助為南非幣一、四六六、二七五、〇〇〇 Rand。（按照一九六二年的兌換率一個 Rand 合美金一元四角）其中三六、六五六、〇〇〇 Rand 指定作為文化和技术援助的經費，八三、七二二、〇〇〇 Rand 作為技術人員援助經費。其餘的作為軍援、財政會議經費、經濟援助經費和行政經費等用途。

在殖民時代，法國就非常注意利用非洲殖民地的軍事潛力，法國並沒有為每一個殖民地建立國軍（national army），法國所建立的是一個龐大的殖民部隊（colonial army），可以在任何地區担任軍事任務。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有兩萬五千名非洲士兵死在歐洲戰場上。一九一九年，法國將徵兵制度擴充到整個法屬非洲。一九五六年九月，法國設立了六所訓練學校，專門訓練軍官，從事殖民部隊的建軍工作。

當法語系國家獨立時，除幾內亞、馬利和上伏達外，均與法國訂有軍事協定：這些防禦協定大致包括三點：（1）法國提供軍援，協助非洲國家建立國軍，（2）法國將軍事責任轉移到非洲各國政府，贈予基本的裝備和設施，（3）法國經非洲國家之請求，直接予以軍事援助，協助請求國之防禦。根據這些軍事協定，法國有保留軍事設施和設立軍事基地的特權。法國最重要的軍事援助是訓練大批非洲軍官。在某些法國的軍校中，非洲學生佔百分之三十五。一九六〇年至一九六四年，有二、六〇〇名非洲學生在法國接

受軍事訓練，包括海陸空軍和憲兵。法國在非洲的軍事人員大約有一萬六千人，有十八個各種不同的軍事代表團，由二、五〇〇名軍官所組成。

法國與非洲國家在軍事上的密切關係，使法國不可避免的捲入非洲國家的內政。剛果（布市）於一九六三年，加彭於一九六四年，查德在內戰多年中，均要求法國鎮壓國內的叛變。一九六三年和一九六四年之際，法國並應茅利塔尼亞的請求協助拒絕摩洛哥的領土要求。而且非洲國家政變頻繁，法國根據軍事協助，可以作有利的選擇，支持親法的領袖。

戴高樂於一九六四年一月間，舉行記者招待會時宣稱：「從現在開始起，合作是法國偉大的志願（Cooperation is from now on a great ambition for France）」。法國對法語系非洲國家的援助是在「合作」的口號下進行的。一九七一年，龐畢度總統在接見法國某雜誌記者時表示他對非洲的態度，他希望促進和加強法國與法語系非洲國家的關係。同時宣佈：法國在一九七一年對非洲的援助將比一九七〇年的援助增加約百分之十五。

法國之所以積極援助非洲國家，一方面也許是因為人道的立場，一方面是由於法國在北非和中南半島的雄心受到挫折後，乃轉向熱帶非洲國家。法國援助非洲國家，可以合法的期望某種長期的政治和經濟利益。一九七一年二月，龐畢度訪問非洲五個國家後，對他的內閣說：「法國在非洲大陸的這一部份據有一個特權的地位，就道義的責任和政治經濟的利益均不允許此一地位退化。」最後，法國人堅信：法國的文化價值有其普遍的有効性（universal validity）。法國革命的理想不僅是為法國，也不是為歐洲，而是為全世界的每一個人。法國人從來沒有將自己限制在法國的國境內，將法國人的觀念和文化傳播到全世界是法國人給予援助的根本動機，有時可以說：就法國而言，援助是現代形式的文化擴張（modern form of cultural expansion），法國的援助，百分之四十為技術援助，這種與軍事和經濟帝國主義相反的文化帝國主義（Cultural Imperialism），法國人引以為榮，而法語變成了法國文化的傳播工具。法國正式給予其殖民地獨立十年後的今天，仍然在非洲大陸担任一個重要角色，除保留着若干軍事基地外，具有龐大的經濟和文化影響力，法國在非洲砂礫上所建築的政治帝國雖已瓦解，可是所留下的文化帝國將有長遠的影響。